

数字化技术背景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优化

◎ 侯 倩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承的精神血脉和独特的精神标识,有着以文化人的重要育人功能。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互联网信息媒介样态的多元化、传播渠道的泛在化、受众需求的个性化,也带来了文化育人的数字化革新。数字化技术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优化,有着规避陷入技术伦理的价值导向、实现以文化人的育人价值目标、防范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价值诉求。数字化技术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发挥的现状表现为:传统性文化育人观念、单调性育人内容供给、割裂性文化表达形式、僵固性文化育人机制。基于此,数字化技术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的优化,应提升数字化技术应用认知度,强化数字化赋能及数字化媒介载体创新意识,完善数字化教育共享平台,以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的理念、内容、方式及机制。

关键词:数字化技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优化路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作为一种观念上层建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功能在于用优秀的文化元素塑造人、教化人。数字化技术发展带来了人类生存方式的深刻变革,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进入数字化革新阶段。抓住国家实施数字强国战略的重要机遇,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数字化技术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优化的价值意蕴

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信息传播和接受方式的深刻变革,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提出了新的挑战。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有利于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可以从教育教学数字化革新的价值导向、价值目标、价值诉求出发,认识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的价值。

(一) 规避陷入技术伦理的价值导向

文化功能是对人和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所起的作用。文化对社会的作用最终要通过对人的作用来实现,其作用如何,取决于文化的先进性及社会主体对文化的认同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文化基因和深厚的思想智慧,在涵养主流核心价值、提升文化自觉自信、

形塑爱国道德情操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育人功能。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教育”正在重塑传统教育生态。数字化时代的教育方式革新,让教育内容的传递方式变得智能化、虚拟化、便捷化、个性化。与此同时,带来了教育主体功能的弱化及教育过程、教育评价、教学效果等教育实施层面的技术化、数据化、表面化。在数字化技术发展背景下,如何确保人们形成科学的价值观念、正确的道德情操、丰富的精神世界,显得十分迫切而紧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哲理智慧、道德情操、人文精神,对于规避数字化时代数字异化、技术主导带来的技术伦理弊端,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 实现以文化人的价值目标

以文化人旨在用文化培育人,用人文精神激励人,从而升华并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拥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和育人资源,是教育以文化人的强大根脉。教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需要挖掘其以文化人的功能,以培养高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数字化技术发展背景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深厚的文化元素有机融入教学,可以拓展教学的文化厚度,增强教育的文化内涵,有效提升教育教学的思想性、亲和力、感染力;可以让教育教学根植于深切的人文关怀,给予教育对象深远的智慧启迪和精神引领;有利于通过人文情怀的化育,升华人的精神追求,完善人的道德体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可以避免数字化技术发展带来的技术伦理问题,降低

侯倩: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数字异化的负面影响,提升教育教学实效性。

(三)防范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价值诉求

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有利于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对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具有重要价值。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十四五”时期文化强国建设的顶层设计,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作为一种观念上层建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的观念共识是意识形态的重要体现,集中反映了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与价值取向,广泛影响社会成员的认知与行为。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可以增强社会成员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基于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巩固具有内在一致性。然而,在数字化技术发展背景下,西方错误社会思潮,如“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更容易隐藏在数字技术中,假借“现代文化”或“新潮文化”的外衣,试图解构和消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弱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将西方价值观念上升为全人类的普遍价值。面对不断升级的意识形态风险,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不仅能够提升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信,防范西方意识形态和错误社会思潮渗透,而且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保障和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二、数字化技术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优化的现状分析

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育人观念、内容与方式的革新。文化育人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柔性融合式育人方式,与体系化的灌输教育课程不同,在数字化技术利用与挖掘方面缺乏明确的统一部署和顶层设计,从而导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优化面临着一定的现实困境。

(一)传统性文化育人观念

文化育人是指用文化塑造人、教化人,“其实质是使人文明化、人文化,包括自然人的社会化、自发人的自觉、蒙昧人的启蒙和开化”。文化育人观念是在文化素质教育观念基础上发展和创新而来的,其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1995年提出文化素质教育思想开始,通过厘清素质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的关系,探索了文化素质教育的内涵,明确了文化素质教育对素质教育的助推作用和重要地位。2012年4月,高等学校文化育人研讨会暨第五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文化育人理念,倡导高校将文化育人作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灵魂和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探索有利于文化育人的新理念新模式新方法。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互联网集聚“社交”“贸易”“娱乐”“云端服务”“资源共享”“虚拟世界”等多元立体功能,带来了人们对互联网传播的高度依赖,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学习方式、行为规范。如何有效达成文化育人目标,对传统文化育人观念提出了新的挑战。如果将文化育人定义为通过单纯地提升文化素质或者单一地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已然不能适应数字化技术背景下文化育人的要求。相应地,这也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和育人功能优化带来了新的挑战。

(二)单调性育人内容供给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文化育人内容,凝结在“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如农耕、造纸、建筑、园林;包括精神文化,如道德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包括制度文化,如包括“家国同构”“血缘宗法”在内的制度体系;包括行为文化,如服饰、饮食、民居、时令、风俗。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实现,主要通过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纳入大中小学课程体系或融入校园文化活动等方式,其内容供给的方式主要以主题性、系统化、深入式的灌输教育为主。然而,数字化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是“快餐式”的浅阅读。相较于系统化、体系化的深入阅读,“快餐式”浅阅读对当代青少年更具吸引力。从数字化技术驱动社会发展有益的一面来看,数字化技术加快了信息传播、知识获取、价值传递方式的迭代,因为“浅阅读不是不阅读,而只是阅读方式的一种转换,它是社会文化变迁在知识传播领域中的表现,也是新的时代背景下阅读领域展现出的新特点和新趋势。进而言之,作为一种时代的表征,移动互联时代的浅阅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亦有着可观的发展潜能”。同时,数字化技术驱动的“快餐式”阅读习惯,对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内容供给提出了新挑战。

(三)割裂性文化表达形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道德理念、价值取向需要借助契合受教育者需求与特点的方式,才能达到育人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加强互联网思想政治工作载体建设,加强学生互动社区、主题教育网站和‘两微一端’建设。”这不仅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运用互联网思维推进工作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方式提供了具体指导。由此,文化育人的载体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丰富和发展。然而,现实中文化育人与受众需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割裂,文化育人更多的

是完成了育人内容的单向传递,缺乏立足受众需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内核的耦合式交融创新。尤其是在数字化技术快速发展带来互联网信息媒介形态多元化、传播渠道泛在化、受众需求个性化背景下,更需要借助端网联合传播、社交话题营销和媒介联合发展,依托多渠道覆盖、多终端布局、立体化引流矩阵的数字化技术,增进育人内容与受众的黏合度,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化技术驱动下,实现育人内核价值与创新发展力的多元释放。

(四)僵化性文化育人机制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优化,需要构建相应的体制机制。合理有效的文化育人机制,有利于协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各环节之间的关系,使其能够更加系统化、制度化、长效化地发挥整体育人效用。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的研究机制能够抓住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这一关键,不断完善研究的思想体系与学术体系;其宣传机制能够充分利用传统媒介与新媒体相互融合的宣传平台,形成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的联动矩阵;其教育机制能够通过较完善的教育、教材、学科和培训体系,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渊源、发展脉络、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的认知。尽管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的体制机制在资源和实践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完善。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促使信息传播方式由单向流动到多向、交互、共享、多样态、超时空的全方位立体化传播,塑造了一个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方便快捷的全新网络生活实践平台与空间,促使人们思维方式、交往方式、学习方式、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革。数字化技术驱动下的虚拟互联网世界在信息的集合和运用上具有极大的多维性、直观性、逼真性、交互性、创新性和综合性,呈现出空前复杂化的虚拟与现实实践高度交融的综合性特征。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实现,但传统僵化的文化育人机制已然不能适应和有效整合数字化技术驱动下的文化育人资源,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实践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

三、数字化技术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优化的路径选择

在数字化技术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优化,关键在于如何充分挖掘和利用技术发展的机遇和优势,实现文化育人目标。通过分析数字化技术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的价值及现状,本文主要依据育人理念、育人内容、育人方式及育人机制的实践逻辑,提出一种以文化人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建议。

(一)提升数字化技术应用认知度,革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观念

一是理解数字中国建设战略的意义,提升数字化

技术应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的认同度。数字化技术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大数据是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数字化技术应用可以促使人们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变革。“大数据具有催生社会创新、变革的力量,但释放这种力量需要观念解放的激发。”因此,我们应重视提升对数字化技术驱动下数据量化、数据资源、数字赋能等观念的认知。在数字化技术驱动下,互联网空间的任何活动都会留下数据痕迹,而这些数据痕迹形成的数据集合是文化教育资源的构成要素,可以用于分析当代青少年的文化育人参与度和认同度,用于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

二是加快数字化技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中的应用推广,推动文化育人转型升级。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以文化创新为动力,进一步推动科技和文化融合,加快形成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无论我们选择与不选择,大数据技术进入文化领域是必然的选择。”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文化育人搭建了一个开放、发展、融合、共享的空间。数字化技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中推广应用,文化数据的有效挖掘与开发,无疑将加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方式变革,实现基于数字化技术发展的文化发展与传承创新。

(二)增强大数据思维和数字化赋能意识,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内容

一是准确把握数字化技术驱动下信息传播和受众阅读特点规律,注重受众体验,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联网内容供给。首先,针对数字化技术驱动下受众的浅阅读习惯,采用生动形象的数字化文化宣传产品,表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理念、道德规范、人文精神,深入浅出地把晦涩难懂的文化内容做得走心、易懂、易行,在情感共鸣中实现先进文化和核心价值的有机嵌入。其次,根据数字化技术驱动下数字化算法,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供给,把脉数字化技术下互联网受众的文化需求与痛点,在净化网络空间、澄清舆论热点、引领社会思潮中,沉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再次,强化互联网优秀文化内容的议题设置与文化引领,注重围绕传统节日、纪念日、重大事件等议题,精心设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内容,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内容设计与文化引领。

二是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思维和模式转换升级,注重运用并延伸数字化技术,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线下育人内容供给。首先,利用大数据,掌握青少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程度,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主渠道和多元化育人载体内容设计,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实效性。其次,利用大数据,精准把握青少年对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的意见反馈,革新并优化文化育人内容,



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的时新性。此外,注重运用数字化技术,预设符合受教育者认知和接受特点的育人内容,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线下金课、品牌实践活动、育人宣传标识,抢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先机与阵地。

(三)强化数字化媒介载体意识,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表达方式

一是优化文化育人数字化载体平台,借助数字化媒介融合优势,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的精准性。媒介融合,是在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通信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推动下,在经济利益与社会需求的驱动下,不同媒介形态在内容、传播渠道、媒介终端等方面的融合。借助数字化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多媒体融合优势,可以优化数字化广播、数字电视、网络自媒体等传播载体渠道,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优势互补,发挥融媒体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实时互动性的倍增效应,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方式动态化、科学化、切合性,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

二是创新文化育人数字化表达方式,融合育人目标与受众需求,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成效的可持续性。在数字化技术驱动下,互联网文化信息传播具有碎片化、及时性、社交化等特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表达方式需要革新传统的单向输出方式,将育人目标有机嵌入受众需求。借助数字化音视频、社交媒体、文本图片等多元输出方式,加强文化育人表达方式的关联性、联动性、体验性、趣味性及内容表达的生活化、故事化、碎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表达方式和育人通路的多元化、个性化发展。广大教育工作者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基于开放共享、实时互动、特色鲜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表达机制和文化价值传播机制,借价值性高、影响力强、传播力好的数字化多媒体传播渠道,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的实效性、益精性。

(四)建立完善数字化教育共享平台,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资源整合和实践机制

一是完善数字化技术驱动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体制,提升文化育人功能发挥的科学性、精准性、实效性。建立数字化技术驱动下文化育人的决策、协调、发展和执行机制,从制度上规范文化育人数据的开发与使用,规范文化育人数据生产方、采集方、供应方、使用方行为。要在加强安全和隐私保护的前提下,积极推进文化育人数据资源开放和共享,明确文化育人数据资源共享边界与方式,厘清数字化技术获取使用的权利与义务,维护好文化育人利益。应充分利用辐射全国的对文化进行数字化管理的公共服务平台,推进并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资源整合应用的大数据建设与发展战略,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

人功能优化奠定基础。

二是完善数字化技术驱动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实践机制,搭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共享平台。随着大数据的发展,各国纷纷调整教育政策方针,旨在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促进国家战略目标实现。因此,应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的数字化资源整合利用的顶层设计,系统性梳理和结构性整合优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将其纳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数字化战略。应推进国家大数据战略规划和教育信息化基础数据库建设,利用大数据技术,全方位、全维度、全链条赋能文化教育发展,解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与以文化人中的问题。建设并完善文化教育数字化发展基础信息网络体系,加快传统文化教育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培育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数字化素养,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地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提升的具有可持续性的体制机制。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文化育人数字化革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模式转型升级提供了机遇。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的数字化价值,充分整合数字化技术驱动下信息传播载体、资源、渠道、方式,积极完善数字化技术驱动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体制机制,已经成为数字化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功能优化值得借鉴与深入思考的重要课题。随着数字中国建设战略的不断落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机制体制不断完善,文化育人价值的数字化挖掘必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内容革新和育人功能优化升级。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 [3] 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
- [4]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5] 蔡骥.移动互联时代的阅读变迁:对浅阅读现象的再思考[J].新闻记者,2013(9).
- [6] 崔成泉,王晓芳.大数据大文化[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

[本文系2022年度山东省青少年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网络亚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影响机制及引领策略”(项目编号:22AJY008)阶段性成果]

(本文编辑:张爱红)
(255000 山东理工大学)